

当代日本哲学家

卞崇道 加藤尚武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3066

K 833.135.1
1

当代日本哲学家

卞崇道 编
加藤尚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2

(京)新登字028号

DK67/L9

当代日本哲学家

卞崇道 加藤尚武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1202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0.75印张 279千字

印数0001—1500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288-0/B·39 定价: 6.9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加藤尚武

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这是日本人非常关心的问题。因此，外国人所著关于日本人特征的书籍往往成为日本的畅销书，日本出版的这类著作，欧美人的居多，东方人的少。日本人的确有崇拜欧美人的倾向，有乐于了解欧美人片面的日本人观的倾向。东方人的日本人论过于正确，反倒没有意思。

在现代中国，哲学研究者观察现代日本哲学家时，将会看到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只要看一下本书目录，首先就会为收入如此多姿多彩的思想家而惊叹。马克思主义与德国观念论、佛教与西田哲学、英美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伊斯兰学、M·韦伯等，这种多元的倾向共存于一体。在这些立场相互对立的支持者中间，最近没有发生过于激烈的争论。

“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存在主义”，这是50年代流行的主题，如今不再为人所议论了。60年代导入苏联和中国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运动的领域中，曾产生激烈的党派争论。这时，一方面存在着从理论上缜密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古典文献的倾向，如广松涉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就是一个卓越的成果；另一方面，竹内良知、竹内芳郎在追求包含全人类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关心存在主义的热情减弱了，代之而起的是强烈地关心现象学（70年代）、结构主义（80年代），这与取代经济学而热切关心文化人类学的倾向相平行。在历史领域中，有关文化史的著作泛

滥，而关于经济史方法论的研究却正在衰退。

90年代所发生的重大思想事件，是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在苏联被否定了。在这种状况下，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在积极地发表意见的，唯有广松涉。他认为，计划经济与马克思主义未必是同一的，马克思的哲学本质并非存在于依靠计划经济实现经济发展这个层次中。

另外，梅原猛、中村雄二郎等人对于脑死与人体器官移植、环境保护等现代问题，不断表述自己的主张。在现代文化中，机械论的自然观具有比较强烈的影响，为了与之抗衡，梅原猛积极支持有机体的、万物有灵论的自然观。

科学、技术能与人性调和吗？

在人看来，正确的自然观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才能成功地保护自然呢？

在现代日本，上述问题不断改变其形态并为人们所讨论，然而，深入发掘和研究自然哲学与技术论的倾向却并不强烈。许多哲学家只生活在大学，研究活动颇受限制，因而始终存在着单纯的文献学研究的倾向。必须进行大学改革，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样的呼声越来越高。文部省（教育部——编者）也正在努力推进大学改革，许多大学都制定了取消“哲学科”的计划。

日本哲学研究者如果总是安于文献研究的话，那么，哲学研究本身也有可能从大学消失。因此，必须改革哲学研究的方法，我认为，这种改革应该遵循下述方向：

第一，积极捕捉现代社会直接面临的问题，与哲学以外的理论的、实践的领域展开交流。

第二，搞清楚现代西欧思想中诸种对立立场的根本前提，以发现新的统一的原理。

第三，不是因袭西方思想史记述的片面教义，而是根据东西方思想的原始资料，进行重构思想史的尝试。

第四，导入计算机处理基础文献，由此创造与民间一般人进

行共同研究的条件。

今天，日本哲学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是批判和克服迄今的日本哲学素质。

最后尚须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要加强与外国共同研究者的交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他人才是认识自己的根据。为了观察日本哲学，并对之进行严肃的批判性考察，无论如何也要正视外国人眼中的日本哲学的形象。为此，对于倾注艰辛劳动的中国的日本哲学研究者，我要说一句肺腑之言：“谢谢”。

1992年2月于东京

目 录*

序言	加藤尚武 (1)
市川浩	卞崇道 (1)
井筒俊彦	石川泰成 (9)
今道友信	李心峰 (16)
岩崎允胤	王 维 (27)
梅原猛	魏常海 (36)
大森庄藏	野家启一 (46)
冈田武彦	李今山 (59)
加藤尚武	金波 弓克 (72)
泽田允茂	李树琦 (79)
芝田进午	卞崇道 (93)
末木刚博	孙中原 (106)
铃木正	王守华 (118)
铃木亨	卞崇道 (124)
竹内良知	卞崇道 (135)
竹内芳郎	范作申 (145)
武谷三男	徐玉华 (154)
寺尾五郎	王守华 (164)
永井成男	李树琦 (171)
中村元	孙 晶 (185)
中村雄二郎	卞崇道 (195)

* 本目录按姓名的日文发音字母顺序(五十音图)排列。——编者

西谷启治	赵乃章 (207)
广松涉	卞崇道 (215)
船山信一	卞崇道 (229)
星野芳郎	远德玉 王子彦 (242)
本多修郎	金波 弓克 (255)
前田专学	孙 晶 (264)
丸山真男	吴晓林 (271)
三宅正彦	陈化北 (283)
山崎正一	范景武 (295)
山本晴义	卞崇道 (304)
汤浅泰雄	李甦平 (315)
吉田杰俊	高淑娟 (323)
后记	卞崇道 (333)
附录: 编撰者简介	(335)

市 川 浩

卞崇道

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身心关系问题，始终是哲学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近年来，日本哲学思想界在现代精神医学、深层心理学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重新兴起对身心关系的研究志趣。与西方哲学界的研究视角不同，日本学者的研究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颇具东方哲学的思维特点。在众多的研究者中，明治大学教授市川浩可谓是成果卓著的一位佼佼者。

市川浩1931年生于京都市，1954年京都大学文学科毕业，1964年修完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硕士、博士课程，1965年任东邦大学讲师、后升为副教授，1969年转任明治大学副教授，1972年升为教授。因其在哲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绩，1975年曾获“山崎哲学奖”（山崎正一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哲学家，1973年起设山崎哲学奖——笔者）。现属日本哲学会、日本科学哲学会、比较思想学会、日本符号学会会员。其主要著作有《作为精神的身体》（1975）、《柏格森》（1983）、《“身”的结构》（1984）、《现代艺术的地平》（1985）。还有共著、编著、重要论文多种。

始于非哲学的哲学研究 在欧洲文化中，精神主义是其主流。奠定了西欧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基础的笛卡尔认为，唯有精神（理性）才是通向认识真理的道路，不能导致理性的感觉是错误的源泉，从而低估感觉的作用。这种精神主义即便在东方，如在给予日本以极大影响的佛教文化、儒教文化中也有所表现。当

代许多哲学家都是通过接受这种精神主义文化的启蒙而走上哲学旅途的。市川浩在青年时期也表现出明显的精神主义倾向，与众不同的是他却因之一度陷入与精神分裂症相似的身心分裂状态。这种状态与笛卡尔依靠理性把握的真理世界极其相似，在这种世界里，人类以生存状态体验的具体性颜色、声音、气味、手感不复存在，一切都被还原到电磁波的振动数及其他物理学状态中，从而失去具体意义。人被从现实中异化出来，事物失去了“我感觉到”这样的亲密性。

市川认为，这种丧失现实的离异，是通过与现实的具体接触，即零散感觉的恢复慢慢进行的。笛卡尔通过理性虽可证明物体存在的可能性，但各个物体的具体的实在性若不借助于感觉是无法把握的。晚年，笛卡尔把“心身合一”考虑为第三种原始观念，它与“精神”、“物体”这二种原始观念相并列且不能还原为精神或物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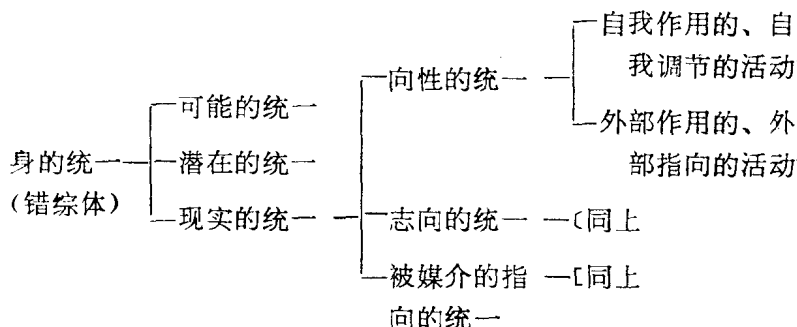
这种体验促使市川开始哲学思索，但他不是从笛卡尔“心身分离”的二元论出发，而是把“心身合一”即佛教所说的“身心一如”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若从西方近代哲学观来看，这正是始于非哲学的哲学旅程。

身心合一的哲学观 市川认为，“身心合一”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着的具体的人之存在状态，起初，他以“作为精神的身体和作为身体的精神”来表述这一状态，后来又用汉语中的“身”来标记。

从身心合一的一元论出发，如何理解“精神”和“身体”同“身”之间的关系呢？市川认为，把“身”具有的某种统一倾向抽象化的东西是精神，把在其它层次上或其它样态上的统一抽象化的东西是身体。概言之，两者不过是把人之现实存在的两个侧面抽象化了的极限概念。当然，两者由于统一的层次和方法的不同，也表现为相互对立的形式；假如统一解体，“身”就成为单纯的“物体”。因此，无论在生理意义上，还是在文化意义上，“身”都不能脱离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中，“身”并非如笛卡尔

所考虑的“精神”和“物体”那样的实体，而是被置于他者关系上、在与他者关系中产生，是被动的维持的缘起性的关系性的存在，并且也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世界内存在”。显然，在市川的哲学思索中，“身”被把握为超越精神与身体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始元概念。

从对“身”的上述规定出发，市川把“身”看作是各种“统一”的错综体，也就是具有潜在性统一可能性的身体。从身的统一状态乃至方式的观点上，他把这种统一分为三种，从关于各自的阶层秩序的观点上，又把每一种统一再分为三种，进而从作用对象的观点上，又区分为二种作用方式，图示如下：



身的结构与作用 首先，关于第一层次的结构问题，市川指出，“现实的统一”是我现在实现的统一。譬如我坐在写字台前思索、写稿；我也可边走边思索边口述。我的“现实的统一”不过是实现了现在马上能够实现的其它种种潜在性统一之一，此时，另外可能实现的统一被抑压而潜在化。如我现在正在工作而不是在游泳，但只要我想游泳，我的身的统一中有着任何时候都可游泳的潜在性。假如我不具备这种潜在性，但只要从现在开始练习，游泳则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我具有学会游泳的可能性的统一。

市川认为，人就是上述种种统一的“错综体”，历经过去、现在、未来作为可能性获得抑或失去这些统一，并且共时地即同时

或继时地在时间的经过中实现其中的部分统一。这些统一在与物理的、生理的环境以及文化的、历史的环境之相互作用中进行，因此身的统一不是只在一个层次上进行的。无论在生理的层次上，还是在文化的层次上，“身”都内含着地球的历史与生命的历史以及与种种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

其次，关于身的第二层次结构问题，市川指出，从阶层秩序的观点上把“身”区分为向性的统一、志向的统一和被媒介的指向的统一，这不过是为了便于理解“身”的结构单纯化。身不是上位-下位型阶层结构，因为各阶层间有相互作用，有时还能有飞跃阶层的相互作用。如在“身”的用法中，“渗入身中”这句话表示药渗入伤口的疼痛；但象“人情渗入身中”或“世上的冷风渗入身中”这样的句子，也可以心代身，换成另一种说法：

“渗入心中”。两种说法间略有微妙差异，与“渗入心中”不同，“渗入身中”伴随有“药渗入（身的）伤口”的切实感，它不是单纯的比喻问题，而是显示了“身”的状态的现实结构。

市川认为，向性的统一是一种下意识的作用，它在植物、动物中也有表现，是扎根于“向……（避免……）”的作用（趋光性、背光性等）这一共同基础上的。向性的统一包含着从生理层次的自动作用到被压抑的无意识作用，它在这一层次上确保身的最低限度的生存可能性。

以向性统一为前提，志向性的统一才成为可能。志向性统一是在意识层次进行的，因此它不是自动作用，而是从对于环境的种种行动可能性——或者从对象的侧面说，是对于身的作用可能性——的素描中有选择地进行的。市川指出，这种作用可能性不是单纯作为知觉被素描，而是对于身产生正、负的现实作用，即引起快与不快的情动，因而感觉往往同时具有知觉的侧面与情动的侧面。

上述两种秩序间的关系如何，进而它们与意识自由又有何关系呢？在市川看来，一方面向性统一赋予志向性统一以基础，确

保身的生存可能性，并为志向性统一指示方向，但不决定之；另一方面，志向性统一描绘身的行动可能性，扩大选择的范围（即不是一义性的自动作用），并且志向性统一统帅向性统一，但不全面支配，不过决定大致图式。那么，意识自由是什么呢？市川认为，如果把意识的自由规定为“任凭意识支配身的一切作用”，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要是有意识地施行身的作用的话，反倒引起意识混乱，以至陷入相反的无意识状态。当我们获得超过自己接受能力的信息，或要求相互矛盾的多歧行动时，我们陷入恐慌状态或自闭状态，以至不知所措，原因就在这里。市川指出，意识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它产生于上述两种统一层次的裂缝之中。就是说，即使我们想“要做……”，身体也不一定按其所思去行动。正是这种不自由性反而产生出虽不支配一切也好这样的自由，使所谓意识自由成为可能。由于在志向性统一与向性统一之间存在裂缝或缓冲地带，人才既是环境内存在，又不完全为环境支配，同环境保持着距离，使环境对象化。因此，身既是环境内存在，又使环境对象化，其本身具有这样自我矛盾的结构。这种自我矛盾的“身”，就是所谓“世界内存在。”

工具的编入与符号文化的形成 在阶层秩序中，除上述两种统一外，还有被媒介的指向的统一，此三种统一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与相互浸透。在这里，媒介主要指用具（工具与机器）、符号（身体动作、表情、绘画、音乐等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和制度（多数场合与前者复合而成）；指向是面向包含向性与志向性的环境而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功能。市川指出，用具主要用来补助、延长、扩大和代理（自动化机械）人对于物的行动，这样的媒介即便在野生动物中，也能赋予最无力的人以创造技术文明、支配自然的强大力量。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工具、机械以及身的功能外部化，有可能导致人依靠科学技术灭绝野生动物、破坏地球环境乃至使人类自身的生存也陷入危机。这就是说，如果把用具作为身的一部分发展的话，那么用具的改良与发展中存在一定的界

限，发展的方向也被限定。如果用具通过被外部化而从身分离出来，则能自由地编入身的功能之中，或取而代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地取来手边工具使用的时代，我们虽然没有在意，但当我们把工具编入身的功能时，同时已经把身编入工具的功能之中。市川指出，这种情况在产业革命之后带来许多问题，如一到工业机械的时代，我们便被置于机械支配之下，必须按照机器的构造与速度工作。为使机器24小时运转，劳动者采取三班制或四班制，这就要使身的时间吻合机器的时间，从而导致破坏“身体钟”，使之与社会生活不吻合的结果。因此，工具的发展与制度问题密切相关，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其产生根源也在于此。

如上所述，市川认为符号是第二种媒介，其首要意义是对于他者的功能的媒介，补助、强化对于他者的行动，有时代理之。与工具比较，符号与身的联系更为紧密。市川指出，符号主要是通过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被编入身的功能之中的。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语言发生急剧的变化。起初，语言是作为呼唤妈妈或保护者的哭泣声和叫喊声，这是起最低限度交流作用的外言（外向表现的语言）。从3岁到5岁左右，孩子迅速学会分节语言，通过交流理解他者，以更漠然的形式把握自己。这种自我把握表现为第一反抗期^①。在这个时期，语言的获得、与他者的交流、与自己和他者的区别、与物的区别，这些人格形成的因素一举涌现出来，这是被称作3岁孩提的危机的缘由。这个时期的后半期，出现一种特殊的外言，叫“自我中心性语言”。只要是外言，就是交流的语言，可仔细观察，这种语言却近乎于自言自语（边画画边自语的孩子），这时孩子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自我中心性语言在学龄期迅速消失，思维能力急速发展，从而自我中心性语言内言化，成为思考的语言。这时孩子开始说慌，因为

^① 参阅《“身”的结构》，第146～149页。

内言世界对于他者来说是被隐藏的世界，他者只能听到外言。说谎并不是危险的事情，莫如说不会撒谎的孩子倒是危险的，这也许是在内言世界没有充分发育的象征，这类孩子在独立要求变强的青春期（第二反抗期）往往引起问题^①。

非语言符号（手势、表情自不待言，绘画、音乐亦是）恐怕早于语言，至少是同时发生的，这与知识相关，又与情感的表现相关。

市川通过以上分析，说明人们通过确立内言世界，不仅形成支配外部世界的技术文明，而且形成表现对于他者的感情、想法的文化。虽说如此，这和工具的形成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工具和以工具制作的東西中，都包含着人的理性与情感、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它们都被外部形象化了。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直截了当地表现它，通过以支配外部为目的的技术的发达，使常被我们自己眼睛遮掩的人的生活要求明朗起来。

在分析符号被编入身的功能的同时，市川指出，我们必须注意身也因之被编入符号特别是语言的功能中。人们的思考和感情都受符号制约，都被编入符号。特别在今天这样的信息社会中，符号编入引起越来越大的问题。市川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世界都正向一体化方向发展，某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的事情马上影响全世界。可是，我们依靠什么了解发生的这些事情，形成对世界的看法呢？这就是信息。然而，我们又依靠什么了解信息的真伪呢？及时了解全部信息的真伪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信息和现实的差别会越来越不明确，而我们实际上又是把信息作为现实来行动的。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能够获得丰富信息的今天，却大量暴露出按照难以证实的信息行动的信息经济危机。由此市川提出下述值得注意或值得商榷的观点：机械、信息以及其它一切疑难问题都根源于人的长处，人类文明也

^① 参阅《“身”的结构》，第150—151页。

许逼近长处转化为短处的临界点。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市川的身心关系论是试图摆脱近代西方哲学的束缚，以现代科学为依据，重新探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表面上，它似乎回归到东方“身心一如”的思想上，但实质上它又远远超出了这一层次，而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这一研究给予我们以这样一种启示，即东方的传统思维和传统文化在现代有可能获得新的发展。

井筒俊彦

〔日〕石川泰成

井筒俊彦，1914年生于东京。1937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1937至1968年任该校教授。此后任加拿大马基尔大学教授、伊朗皇家哲学学院教授。现任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国际哲学协会会员。

井筒俊彦是日本著名的伊斯兰哲学研究家。他的有关伊斯兰哲学原典、理论和历史的著述很多。近十几年来，他的研究活动不仅限于伊斯兰哲学，而是向包含伊斯兰哲学在内的整个东方哲学和东方思想转移。

他对东方思想的基本研究方法，在他的代表性著作《意识和本质》的后记中说得清楚。他认为，东方哲学源远流长，它所笼罩的地域十分广阔，其中包含着各民族的各种思想，或者思想的要素。有一些思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很久；有一些却只有数世纪的短暂历史；有一些直到现在还保持着生命的活力；而有一些却已经衰亡了。上述种种思想潮流，都可以冠以“东方哲学”的名称，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我们现在来研究东方哲学，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未来，并探明这些可以称之为哲学思维的创造性开端的形式，这就需加上一些不同于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工的、理论上的操作。井筒把西方哲学看作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的自我展开，而东方思想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地域上都难于作为统一体来把握。为了对东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使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并驾齐驱，就有必要在研究中加上某种“人工的、理论上